

我们永远怀念李薰同志

王大珩*

(根据录音整理)

我是在1941年春天结识李薰的,当时我从伦敦到雪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工艺室学习炼玻璃。李薰已经在那儿有3年的时间了,当时他正在完成博士论文工作。他的论文题目是“钢材淬火变硬的物理机制”。他的研究工作完成得很出色。所以他的论文完成后,就留在了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他的导师是冶金系的主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不锈钢的一名教授,他们在一起做钢铁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次英国的军用飞机在飞行中,钢材出现了断裂,造成了机毁人亡的事故,经李薰研究发现飞机钢材断裂的原因是钢中发裂,材料中的氢脆导致材料的断裂,这在当时是个很重大的发现。雪菲尔德大学为了感谢他的工作,授予他冶金学博士称号。在雪菲尔德大学的冶金系授予冶金学博士是英国政府批准的惟一能授予冶金学博士的学府。第一个获得此学位的是李薰的导师,因为发明了不锈钢,李薰是第二个获得冶金学博士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中国学者得到这个称号。后来他回国后还在继续做如何在钢中除氢的工作,这也是他最主要的研究工作。

在英国,李薰住在一个老工人家庭里,老工人去世后,他继续住在那儿,和房东太太相处的很好。我会做中国饭,每逢星期日休息时,我都要到李薰那儿去做一顿中国饭菜改善生活,房东老太太对我们也很好。李薰获得学位时,请房东太太作为嘉宾参加了授予仪式。有一次萨本洞先生到英国考察,和李薰见面。萨本洞先生当时是世界很有名的电机方面的专家。

我是在1943年春天离开雪菲尔德大学到伯明翰大学,在英国和李薰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和他交往较多的就是这段时间。在我们看来,李薰抽烟抽得很厉害,而当时在英国人中抽烟斗是学者的象征,李薰也是用烟斗抽烟。他不喜欢运动,星期天要睡个懒觉。当时英国在打仗,晚间有宵禁,特别是晚上外国人不能上街,有时在他那儿呆的时间晚了就住在他那儿,我们两个人就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在业务上的话不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雪菲尔德大学平常聊天的有几个同学,有张作梅,有一个姓黄的华侨及谭袁凯的儿子(那是个花花公子),还有庄育智,方柄、张沛霖等。在雪菲尔德大学经常碰到的就是这几个中国留学生。后来我也曾回雪菲尔德大学两次,都是去找李薰玩。

记得好像是在钱三强到英国的时候,我推荐李薰和他见面,我很佩服李薰的学问和才能,他不仅在科学上有出色的成果,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好的修养,他会作诗,我记不得他的诗了,但是到现在还能感觉到他的诗很有感情。

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李薰回国筹建金属研究所,最初是我向钱三强介绍的。我和钱三强是1948年回国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当时要筹建几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研究所,其中很重要一个是如何为发展和恢复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服务开展冶金方面的研究工作,最初是我向钱三强讲述李薰的才能并推荐他来担当此任。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他们当

* 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曾设想,让我专门为这个事情到英国去邀请李薰回来。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去英国,记不清当时是通过什么关系联络到李薰,邀请他回来筹建金属研究所。大概是通过曹日昌,因为他是我们党组织在英国方面的负责人,后来曹日昌任中科院副秘书长。

李薰 1951 年从英国回到祖国。他回来后筹建金属研究所,地址在沈阳,原因是当时全国的钢铁中心在鞍钢,沈阳离鞍钢、本钢等都很近。

李薰回国后,正赶上国内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李薰的父亲是大地主,当时党组织对他特别保护的,使他没有受到冲击,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很快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从老家接了过来。1958 年大炼钢铁时,沈阳市委书记是很有头脑的,支持李薰,没有让在金属所院内搞土高炉炼铁那些事情。因为李薰说大炼钢铁是群众运动,我们搞研究的就不要搞群众运动了。由此可以看出,党组织对李薰的工作是理解和支持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薰吃了些亏,他喜欢讲些俏皮话,例如派了一些不懂科技的人来研究所,这些人没有水平,干不了什么事情,李薰说这是“老黄牛进了瓷器店”。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合理,但是又不得不做的瞎指挥,李薰说这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李薰这个人很正直,不顾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如何,看不惯的就要说。为此他没少挨批判。但是李薰在我国的材料科学界是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大家都佩服他。只可惜他走的太早,我们永远怀念他。

李薰是比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科学家中的党员干部,他严于律己,从不向组织上提出特殊要求,特别是对待子女的问题。当时他有一个女儿在沈阳市公共汽车上做售票员,他积极支持女儿的工作,他的女儿还被评为公交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后来是党组织出面安排了他两个女儿的工作。在当时作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对待个人子女问题上他从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是难能可贵的,是令人敬佩的。在当时这个社会环境中,李薰能自觉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他拉我来帮他的忙,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他去世的前几天,在北京,他还到我那儿聊天(当时技术科学部还在友谊宾馆的北工字楼办公),他来工字楼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要先到昆明,后到攀枝花去看看。当时我们聊得很开心。结果他到了昆明就没有再回来,令人痛心不已。可能是他抽烟抽得太厉害,当时我们在英国李薰就有咳嗽气喘的毛病,有时他咳嗽气喘厉害时,我给他捶背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永远怀念李薰同志!